

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策略

● 王春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 检视 20 世纪中国文论, 由于文艺学承载了救亡、启蒙等诸多使命, 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 单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严重妨害了文学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 中国文化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严重失语; 以及商品经济条件下功利化学术泛滥, 文学及其研究边缘化, 从而致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由此提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两大策略: 夯实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 搭建世界视域内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 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关键词〕 文学理论; 学术根基; 一体两翼; 原创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4)01-0043-04

检视似乎一直处于低迷委顿的 20 世纪中国文论, 我们大致可以探索到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 文艺学承载了救亡、启蒙等诸多使命, 惟独没有完全的自我本色, 文艺学建设往往滞留于更新观念的层面, 而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 其二, 意识形态——反映论成为当代文论主要的哲学依据, 严重妨害了文学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 单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也使“当代文论长期以来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社会政治化思维空间和话语体系里封闭运行, 未能形成自己的话语运作规则和学术建设规范”^①; 其三, 20 世纪西学强劲东渐, 尤其是在最后二十年, 西方文化思想毫无遮拦地汹涌而入, 中国文论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严重失语。恰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中国许多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在高度亢奋地将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潮理论和方法挨个操练一番之后, 旋即无计可施, 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其四, 市场经济浪潮搅扰了人们内心的平静, 更淡漠了对彼岸理想、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 功利化学术日益泛滥。文学褪去了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神圣光华, 靠皮肤思考, 用身体写作毋宁说是为追求卖点的商业化炒作。较之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 文学及其研究相对冷寂并走向边缘。针对文学理论的困窘, 许多可贵的学术诘问、有益的学科研究与理论探索早已在文艺学界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人们见仁见智, 力图激活文艺理论整个学科的生命力。笔者由此提出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两大策略: 夯实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 搭建世界视域内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 并能潜沉思虑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一、夯实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

汪正龙认为, 文学理论学术思想有两种构成形态: 哲学家从各自哲学思想出发, 对文学和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现象所作的理性概括, 即依托于多样哲学思维的自上而下的哲学——艺术哲学; 批评家或文学史家把文学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较为单纯的关于文学的知识系统, 即受

益于文本分析的自下而上的文学诗学。^①因此, 导引中国当代文论走出困境的关键一着, 就是要重新返回文学理论原先惯有的两条知识构建理路, 夯实文学理论的学术根基。

(一) 突破僵死的单一模式, 求索多样化哲学思维

中国当代文论学术根基的奠定须在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要突破僵死的单一模式, 求索多样化哲学思维, 这是文学理论学理生成、累积的热切期盼和必然要求。

20 世纪二三十年中西、新旧各种文化思想激烈撞击、并融, 彼此迥异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竞相论争, 波及创作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主义文学, 一派百花竞放的热闹景象。然而, 此时的文学与理论要肩负民族救亡之大任, 其力图救国救民的政治功利性尤显突出, 所谓的百花争艳实质是为了求得一枝独秀。40 年代,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性纲领。国家新政权诞生、意识形态的统一和一元化体制的构建, 使得文艺的政治功用更加凸显, 政治性、党性及阶级性上升为判识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尺, 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由此陷入大一统模式。至六七十年代, 全国人民整齐化一地依从某种凌驾个体之上的权力意志而生活, 文学与理论对政治的附属登峰造极, 作家、理论批评家的个人言说权沦丧。作家被拘囿在特定的生活场域内, 而且“被限定了的生活该怎样写, 又是需要高度的组织化程序来审判和检查的”。^②文学理论甚至化简、对等于文艺政策, 成为某种强制性的政治规定, 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说:“政策是一种权力行为, 把文学理论与政策搅混一起, 政策就可能替代文学理论, 遏制文学理论自身的不断探讨与前进, 消除理论自身的学理与自律性。”^③作家也好, 理论家也罢, 都无一例外地运作着政治化了的群体思维模式。但是, 文学作为一种本应当独立的审美样态, 其存在价值不应简单化约为某种社会认识作用或现实政治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跨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文艺学建设也汇聚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中。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重大功绩在

于为文学正名,呼唤文学独特的审美性,力主文学向自身复归和还原。李春青认为,八十年代的文艺学研究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价值观念更新,为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话语表征而承担某种启蒙的任务。”^④20世纪末的十几年间,西方的种种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再一次强力入境,在中国文坛及理论界掀起狂涛巨浪,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生代作家和新潮理论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和理论家多处于“经验模造”^⑤阶段,其创作和理论大多是他者理论的移植或中国化翻版。中国文论不容乐观的现实使得我们一方面热切期盼中国的索绪尔、萨特和德里达的面世;另一方面更要坚决摒弃对他者理论和方法生吞活剥的不良消费习惯,力图机智地吸纳其精华、壮己之筋骨。

(二) 强固理论与文学实践联系,使理论获得生成和提升的不竭源泉

毋庸置疑,理论与实践相伴相生,任何理论无不受具体实践的浸润、催发和孕育,并经此后繁富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和确证得以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理论作为对实践经验及规律的某种归总和提萃,必定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因此,反过来会给特定实践行为以规约和指导。实践发展进程中新矛盾、新问题和新现象的出现必然引发人们新的理性关注和思考,而富有效力的理论创新也一定会催生新的实践行为。文学活动生生不息,对一切文学和文学的一切的理性思考就永无止境。文学理论应热切关注文学实践活动(尤其是当下文学活动),垂听文学的要求与呼声,并对新现象、新问题作出迅捷应答。

强调和突出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既能够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时尊重客观、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又可以推动文学理论随实践变化而动态发展;还势必彰显中国文论鲜活的时代性。理论如果与文学现实隔绝、与时代隔绝,就会成为对象缺席的言说。这样的理论必定是短视的、甚至是无效的。中国当代文坛不乏经典之作,却少有经典之说。不少人热衷于活炒现卖所谓的新鲜货,似乎愈新愈现代。这样一来,持论者自得其乐,而释读者即便是业内人士也不免满头雾水、不知所云。姚文放论及1989~1995文艺学建设时指出,文艺学理论著作存在“三少”现象,即“成为学术界重要话题的少,被研究者引用和摘录的少,作为私人购置藏书的少”^⑥理论由于与中国文学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架空、疏离而高高在上,既不能使阅读“览无遗功”,也无法令批评“准的有依”^⑦,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陷落泥沼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虚空悬浮的理论回归喧腾的文学世界。当然,理论的任务并不是作孤立的文本分析,解释一部又一部作品,而是要将广袤的文学视为整体进行探究,以提取普泛的经验与规律。中外文论史上那些声名卓著的理论大家和巨作早已给我们树立了植根文学沃土、理论方能枝繁叶茂的典范。钟嵘的《诗品》品评了汉代至梁代一百二十二名诗人,并分为上中下三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推粗以及精,敷陈详核,条理密察”^⑧,既集当时文论之大成,又矗立起中国批评理论的一座高峰。亚里士多德的《诗

学》之所以成为后世批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源头,应归功于亚氏对五十多部文学作品精奥、独到的分析和推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文论界,曾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构成鼎足之势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是弗莱于《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博观包括《圣经》在内的几百部作品后的新创;巴赫金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建构了自己的小说创作诗学和小说历史诗学体系。当然,广义的文学实践包括中外文学的创作、阅读、接受、批评和比较等活动,笔者着力强调文学理论与实践、文本的密切结合,旨在由此拓展文学理论的探索疆域,开掘新的理论发展资源。

二、搭建世界视域内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

王宁曾描述了文学撰史学发展的新趋向:以多人或多国学者合撰的具有国际性、学术性和比较性的“新”文学史取代由一人从古到今的通史写作;摒弃单一的国别文学史写作,代之以横向(跨越语言界限、国别界限和学科界限)拓展。^⑨(P134)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亦应如此。在一个经济和文化日趋全球化的时代,建设我们当代文论既不能固守国粹,也不可唯洋是尊,而应拥有宏阔的理论视域,寻找新的基点,树立大文论意识,采取前瞻姿态来构建和充盈中华文论的“一体两翼”。姚朝文提出了21世纪中华文论的视域融合的五個层面:传统、现代、当代嬗递中的新生与有机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中华主体民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的有机融合;中国内地文论与海外华文文论的有机融合;中国内地各地域文学、文论流派的有机融合。^⑩我想,还应续入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东方其它各国文论的有机融合,因为,正是风采各异、魅力独具的民族文论共同构筑了世界文论的宏伟与瑰丽,中外文论的交流和融通能更好地体现理论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一) 开放、多元的文学理论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丰盈的、自由的、因而也是开放的,它就象“一株浓荫匝地的巨树,千枝万叶不择地而伸展、粗细不匀却生机盎然地成长着。若悖其天性,硬要将其修剪成马尔里花园式的林木,它就会失去生命。”^⑪由于语言符号的非直观性及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智慧和弹性;文化语境对本文意义的规约;阐释者在选择、吸纳或扬弃本文价值、属性或信息时的个体差异等,文学便拥有了广阔无边的丰厚内涵。就具体文本而言,语言的柔韧、文化场的辐射及阐释差异使其意义含蓄蕴藉;就文学整体而言,将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⑫囊括其中,关涉生产、出版、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已是一个动态、多维的复杂系统。这就使以多种视角和方法探究文学整体中的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及关系等成为可能,为多样态的文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先在的物质基础。

文学既然包罗万象,若生能逢时,理论必当多姿多彩。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信息学、文学价值学和文学文化学等多样化理论形态,既是不同视角和方法介入的结果,又是文学、文艺学与其它学科的有效交叉和渗透。不同学科间的交融互渗,源于学科自身开放式发展及时代共同话语建构的需要。理论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艺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博览古今中外文

论,究其根本,必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而丰赡的。理论形态、观念生成动因与建构方式、话语表述、推证方法及学理模式等呈现丰富多样性。适逢开放时代的春风雨露,中国理论园地万紫千红、莺歌燕舞。自新时期开始,一种文论系统和批评话语号令天下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做居主流也成昨天的故事,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各种理论学说纷至沓来、登堂入室。中国的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走入由众多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构成的多声部时期。杂语共生、多元并存的理论格局已然形成。

(二)“一体两翼”的理论构架

欧阳有权撰文提出 21 世纪文艺理论“一体两翼”的构想:“‘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¹¹西学东渐之时,国人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说虽然有以我为主,要取西学为我所用之意,但是未能具体说明中学怎样发展,西学又该当何用,而且强调了中西学体用之别,突出了二者的差异和对立。“一体两翼”的构想,展示了我们能够广采博览、兼容并蓄的阔大襟怀,不仅显明了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当代中华文论发展的重要,而且主张将中华传统和外来文论化合、熔铸成我国当代文论的双翼。具备了劲健丰满的双翼,中华文论这只大鹏必会再次腾跃而起。

不过,对于中华文论之“体”,我与欧阳先生有不同的理解。欧阳先生强调文论建设要回应现实需求,体现理论研究的现实感和时代性。笔者在前文已有论述,实践是理论生成并得以提升的源泉,当代文学理论必须首先要关注当下文学实践活动,垂听文学吁求,这是理论实践性品格的起码要求和充分体现。让理论立足现实、面向实践,是对理论之树根基的培植,而不能以之作为理论的主体。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所累积形成的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应构成中华文论的主体。中华文论必定是古典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西方及东方其它各国文论三位一体的整合。

最能显现中国文论民族特性的,首推植根中国古代文化土壤的古典文论,欲成世界的,首先必是民族的。因此,开掘传统文论宝藏,实现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重新擦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¹²成为在东西方文明汇通的整体语境中建设当代中华文论的重要步骤。自十九世纪国门被西洋炮舰轰开之后,中国人锐感国家至贫至弱,于是开始“求新声于异邦”,大举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尤其在高扬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时代,传统文化在西方化的热潮中变成大加挞伐的众矢之的。在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并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并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¹³中国古代文论因未能获得充足、适宜

的发展空间而形成了古今阻隔。在更为现代、开放、自由的时代,“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了文艺学界热心研讨的话题。如何实现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使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勃发生机,笔者在此强调三点:其一,古人论及文学创作、体裁、风格、批评等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因其独特的理论个性和价值在中国文论史上散发着无尽的魅力。对于在两千多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历史中所积淀下来的、至今仍有范导意义的文论精粹要予以继承和光大。其二,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是对其原有的概念、话语、范畴和原理等进行直接移植,而是要挖掘古典文论中浸透民族精神气质、彰显本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潜在特质,凸现中华文论最为深刻的民族性。正如果戈理论及民族文学时所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其三,我们将目光投注古代文论遗产,并非要纯粹回归古典,崇古而抑今。既然“中国古典文论的文本不是封闭的,并且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封闭,它一直呈现为开放的状态,并且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永远无尽地接纳无尽的阐释者对它无尽的读解,并且释放出无尽的意义。”¹⁴我们就应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发展实践,在当下现实语境中对古典文论重新进行阐释生发,激活理论穿越时代的生命力。

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古典文论发生时代断裂,却让西学从方式到观念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文论。20 世纪 80 年代西学再次入主东土,国人迫不及待地来自异域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个试将过去。表面看去,中国文坛及文艺学界众语喧哗、热闹非凡,实际上我们丧失了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及规范独自言说的能力,在趋新若鹭、猎奇炫异中自我走向了迷失与消亡,于是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中国文论严重失语,也就此缺失了在 20 世纪世界文论中的应得席位;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融通更趋频繁和激烈。强势文化往往铺天盖地,对弱势文化进行辐射、渗透,甚至挤压。是全面接纳、销蚀自我,还是积极回应,求得互通互补,就成为弱势文化生死攸关的选择。借鉴既定传统和异质文化时,立足高远,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进行审视和评判十分重要,我们既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又要守择善而从的原则,坚决反对全面接受和粗暴拒斥两种态度——要么来之不拒,照单全收;要么如临大敌,关门大吉。尤其对于异域文化,我们既要跟着说,也要接着说,更能对着说。

(三)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不免有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文学创作和研究唯市场是瞻,使学术沦落世俗风尘。建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应该尽可能克服学术研究的功利化,潜沉思虑强化理论原创意识,追求“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文学研究理论化”¹⁵。搭建中华文论“一体两翼”的构架,不是对中外文论进行简单的组接、拼贴,而要面向未来,立足当下实际,予以创造性的整合与发展。我们(下转第 32 页)

献,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民族化这一根本规律。他们的剧作未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未能被更多的一般水平的观众所拥护,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早在1939年,张庚就在延安提出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口号,被当时的戏剧界认为是中国戏剧的发展方向。今天看来,似乎还应该对这一口号略作补充,即话剧既应该强调民族化,又应该强调现代化,两化缺一,话剧艺术就可能产生倾斜,就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就可能成为出现“大家”“精品”的障碍。同时,民族化与现代化,都是对话剧艺术总体性的整合,既非纯内容,也非纯形式,民族化不是单纯向戏曲学习其手法,现代化更不是照搬西方戏剧的演出形式。90多年话剧创作、演出的丰富实践,90多年话剧体式流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创造性地吸纳世界艺术营养、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发展话剧艺术特别是丰富话剧体式的参照系统,有助于推动话剧在民族化与现代化有机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提高艺术品位,强化舞台生命。

六、文本形式与演出形式

话剧作为最重要的文学体式之一,与小说、诗歌、散文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不仅有文本形式,而且有演出形式。话剧的文本即剧本,是舞台演出的基础和依据,演出则是对文本的二度创造,是导演对文本的独特理解与阐释的舞台体现,是演员及舞台美术等全体工作人员对导演意图的具象表现。文本形式与演出形式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话剧体式的整体性、复杂性、独特性。对话剧体式的考察,自然应该包括文本形式与演出形式两大侧翼,应该注意对两大侧翼的整合性研究。但实际上,演出形式是千差万别而

且是与时俱逝因而是极难一一描述的。在文明戏时期,幕表制一统剧坛,相当数量的戏剧是没有剧本的,几种留传下来的“剧本”,有的是演出的纲目,有的是由后人所加工整理,与通常意义上的剧本大不相同,往往很少有文本研究的价值。20年代以来,在写实型与写情型话剧体式兴起以后,剧作家由剧院老板改为文学家,话剧的文学因素急剧增长为话剧的最重要内涵,演出只能在剧本所提供的内容中进行,于是,“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之说,才真正成为现实,对话剧的文本研究,才真正落到实处,对话剧文本的精确描述,才有了现实可能性。但同时,随着剧本权威地位的确立,导演、演员、舞台美术等戏剧工作者的创造,却往往受到有意无意的忽略,对话剧体式的研究,又倾斜到文本一端。新时期里,由于新的戏剧观念的流行,戏剧理论与戏剧批评开始以一种新的尺度来看待戏剧,不但重视其一度创造的成果即其文本形式,而且高度重视其二度创造的成果即其演出形式,甚至把三度创造的内容即观众的参与,也一并融汇到话剧的研究视野,作为话剧体式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来考察和评价。90多年的话剧体式和体式研究,大体上经过了轻文本重演出、重文本轻演出、文本与演出并重的曲折道路,在否定之否定中寻找着自己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与研究方式。尽管每一阶段情况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性原因,但毕竟是最后的研究方式更符合话剧的体式特征,更具备科学性与合理性。

责任编辑:汉河;校对:竹君

(上接第45页)既强调理论的守成,更倡导理论的创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巴赫金的复调和狂欢节化理论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是他们苦心钻研后别具匠心的独创,在文论史上透射出耀人的理性智慧之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综合与创新也具有悠远的启示意义。新问题的提出、新思想的空前启后以及未辟之境的大胆开拓,对于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具有影响深远的重大意义。文学理论要丰富、发展和前进意味着思想观念的变革、理论空间的开创以及对旧说、通说的纠正或拓展。不断创新、日益发展的活理论才会生命长久。

注 释:

- ①汪正龙:《本质追寻和根基失落》[J].《文艺理论研究》,1999,(2)。
- ②吴兴明:《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J].《四川大学学报》,1999,(4)。
- ③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1999,(2)。
- ④李春青、王修华:《对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几点浅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1)。

③姚文放:《进展与问题:1989-1995文艺学建设概观(下)》[J].《文艺研究》,1996,(6)。

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⑦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A].《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⑧姚朝文:《关于21世纪中华文论的构想》[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1999,(2)。

⑨[法]伏尔泰:《论史诗》[A].《伏尔泰论文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⑩[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⑪欧阳有权:《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4)。

⑫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2)。

⑬杨乃乔:《世纪之交的反思——再论“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J].《文学理论学刊》,2001,(1)。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竹君